

纪念新四军成立 60 周年
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铁的新四军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
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

目 录

毛泽东对新四军初创时期发展前途的战略思考·····	朱超南(1)
周恩来在皖南事变前后·····	杨家余(8)
周恩来与新四军的创建·····	马学勤(14)
周恩来对新四军创建所作的贡献·····	汪青松(21)
抗战期间周恩来同国民党争夺叶挺的斗争···	吴祥安 余茂笈(29)
刘少奇与新四军的发展·····	武 军(40)
王稼祥和新四军的发展方针·····	徐则浩(47)
陈毅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的统战工作·····	孙金根(55)
项英在新四军组建中的作用·····	高光智 卓爱平(60)
创业维艰 功不可没	
——记新四军和项英在皖南的主要业绩·····	唐锡强(66)
试论皖南三年项英与叶挺的关系·····	王良虎(76)
试论抗战时期彭雪枫的用人思想·····	廖智富 张怀文(82)
试述彭雪枫在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统战工作	
·····	刘子和 刘其杰(86)
彭雪枫关于部队思想文化建设的思想初探·····	华启新(93)
论新四军抗战的特殊战略地位·····	卓爱平 高光智(97)
加强干部政治思想工作是新四军克敌制胜的根本保证	
·····	周敬青(105)
略论皖南事变前新四军的抗日游击战争·····	房列曙(111)
从国民党电文看新四军英勇抗战的卓著功绩·····	郭希华(120)
我军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	
——浅述八路军与新四军的关系·····	刘曙光(131)
振我军心 扬我军威 铸我军魂	
——《新四军军歌》的爱国主义凝聚力·····	郝延红(139)

统一战线是新四军生存和发展的法宝·····	杨广宝(144)
统一战线是新四军胜利发展的重要法宝·····	蒋二明(150)
统一战线是创建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法宝 ·····	郝长顺 史文敏(156)
新四军六支队与何柱国骑二军的统战关系·····	杨民清(164)
论安徽在新四军抗战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刘以顺(169)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安徽敌后战场·····	徐震秋(177)
论皖南事变妥善解决的国际因素·····	祝中侠(186)
新四军驻安徽地区兵站等办事机构伟业成因之我见 ·····	吴家斌(195)
战争史上的奇迹	
——新四军第七师贸易经济工作成就概述·····	陈家骥(201)
新四军第三支队的组建及其对皖南抗战的贡献·····	周蔚恬(209)
桐东抗日根据地评述·····	余兆龙(218)
血肉相连 鱼水相依	
——论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关系·····	李华民(225)
简析减租减息政策在池州抗日根据地的实施 ·····	胡大源 喻志平(232)
新四军四师在涡北根据地·····	张文军(238)
新四军游击支队到第六支队迅猛发展的基本经验 ·····	乔同兴 李志先(243)
试论皖江根据地军民关系的特点及其历史经验·····	储德铸(250)
泗五灵凤县在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地位·····	武彦楼(257)
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廉政建设·····	杨久梅(265)
论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	李茹英(271)
新四军在岩寺集中期间的军民关系·····	左和平(280)
编后记·····	(285)

毛泽东对新四军初创时期 发展前途的战略思考

朱超南

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的一支新型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它与我党领导的另一支主力部队——八路军一起,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历史功绩。新四军初创时“有些人就看不起这支军队,以为抗日主要地应当依靠国民党。”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由于新四军广大官兵的共同努力,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支原来数量不多的南方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后,在八年抗战中却发展成为一支控制国土“面积达 25.3 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 3400 万人,民兵近百万”的华中抗日劲旅。国际友人史沫特莱称新四军是敌后各抗日部队中“最有效、最文明军事力量”,“是文化水平最高和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新四军所以享有抗日铁军的盛誉,这应归功于毛泽东的运筹、谋划与决策。下面仅就毛泽东对新四军创建初期的指导方针、战略思考作以下论述。

一、新四军在华中不但能够立足而且能够发展,这是关系新四军的前途和命运的首要问题。

毛泽东认定,尽管华中形势严峻,敌情复杂,但只要指挥得当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新四军与八路军一样,一定能够站稳脚跟,发展壮大,建立起我党在华中地区的战略支点,发挥抗日战争“坚强的台柱子”作用。

华中地区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地区,是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文化程度高的地区。正因为华中是“代表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

最有力的地区”，因此，敌、顽、我三方都为在这里立足并扩大阵地开展着尖锐残酷的斗争。1938年春，侵华日军已经占领沪、宁、杭、徐、蚌、芜、合、扬等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而这些大中城市中间的广大农村，则是一个空隙，新四军应该向这些地区发展。武汉失守后，日军停止正面进攻，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李宗仁为首的桂系部队则乘机深入敌后，建立了以立煌（即金寨）为中心的大别山统治区。到1938年底，桂系部队又分兵一部深入皖东、皖中，以及鄂东、鄂东北。国民党鲁苏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率部控制了苏北。第三战区顾祝同指挥的部队则活动在苏浙皖边一带。在敌、顽、我力量悬殊、环境比较险恶的情况下，新四军在华中能不能扎根发展，敌后游击战争能不能长期坚持？这就成为党内外关注也十分担心的问题。

毛泽东深信，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一定会成为我国人民抗击日寇的“主力军”和“模范兵团”。毛泽东并多次指出，新四军干部中的畏难情绪是没有必要的，坚信华中地区与华北地区一样完全有可能得到发展。

1938年5月4日新四军组建不久，毛泽东就致电项英：“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同年6月，毛泽东又致电项英：“地区扩大，已不患无回旋余地。望根据战争的实际经验，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我军均可派队活动。”“敌之总目标在进攻武汉，你们可放手在敌后活动。”1938年10月日寇占领广州、武汉以后，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指出华中一带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主要方针是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1939年6月和10月毛泽东针对华北有可能面临最严重局面，必须把重点转向华中时，指出：“必须大大发展华中的党与游击战争的工作，从复杂的环境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以为全国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1940年1月，当国内妥协与反共逆流再度出现时，

毛泽东对北方局、中原局指出“只有在山东全境及华中发展数十万军队，组织数百万自卫军”，以与全国工作相配合，“才能争取时局好转。而现时能够发展武装的地区，主要的只有山东与华中。”在这里，毛泽东不仅分析了华中地区应当发展的必要性，而且明确指出了华中地区可以发展的可能性。这是毛泽东对新四军迅速发展壮大作出的重要贡献。

二、在如何处理新四军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这个涉及新四军兴衰成败的关键问题上，毛泽东针对国民党蒋介石所具有的既抗日联共又妥协反共的两面性特点，认为在坚持国共合作的同时，必须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反对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毫不犹豫地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国共两党经过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拨归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节制。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共4个支队。每月发给一定军费，由该军长统筹支配。

虽然新四军建立后，由于全体官兵英勇抗敌，蒋介石及国民党军队高层将领曾多次给予表彰。如1938年5月12日新四军四支队一部在巢县蒋家河口伏击日军，取得胜利，5月31日蒋即致电叶挺、项英：“该军游击屡有斩获，至堪嘉慰”。1938年6月蒋介石致电叶挺：“所属粟（裕）部，袭击卫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但是，抗战初期的国共合作较好的关系维持时间不长。相持阶段到来不久，国民党蒋介石就采取积极限共反共，企图削弱与排挤新四军的政策。1939年4月15日。国民党颁布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5月顾祝同就致电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主任戴戟说：“惟查年余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本战区暗中积极活动，违法事实层见。”接着顾把共产党新四军一切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工作与活动都一律攻击为煽惑、破坏等非法活动，认为必须严格禁止和取缔。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实行的限制发展的措施，我要反其道而行之，要冲破他的限制，大量发展自己。他采取联共又反共的两

面政策，毛泽东指示我党必须坚定地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革命两手政策，反对和警惕党内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干扰。

新四军创建后的抗日实践活动完全证明了毛泽东提出的原则与方针的正确性。随着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游击战争的展开与抗日根据地的扩大，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磨擦事件不断发生。1939年6月，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包围湖南平江嘉义镇新四军留守通讯处，并杀害通讯处负责人新四军上校参谋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人。毛泽东气愤地说：“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里灭亡。”在抗战的后方，在平江这个地方，“被杀害的是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负责同志涂正坤、罗梓铭等。”我们要反对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种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国民党所以不断制造反共分裂事件，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争夺与独霸华中地区，正如刘少奇所说：“国民党最初是不愿到敌后去的，而指令我们到敌后去抗战，他们自己站在后方。然而在此时，他们就大胆、积极地向敌后伸展，恢复他们在敌后的统治，并严格限制与排挤我们。”正是由于毛泽东反复强调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重要性，才有力地抵制与防止了国民党的种种反共破坏活动。毛泽东的战略原则是保证新四军健康发展的根本因素。

三、毛泽东为新四军制定了正确的军事指导方针。

毛泽东论证了华中地区能够长期坚持敌后游击战争，而且又确切地指明新四军各支队进军的适宜地区与发展方向。这就为新四军顺利发展提供了行动保证。

早在抗战初期，毛泽东就以其深邃的目光认定，游击战争将在抗日战争阶段发挥重要的战略作用。1937年9月21日他给彭德怀的信中说：“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同年9月25日他给周恩来的信中说：“要告诉全党（要发动党内党外），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

游击战争”。随着我军在山东地区游击战争的展开，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不但山地而且平原地区同样能够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毛泽东认为，华中地区虽然在地理、经济、交通和敌情方面均有着自己的特殊性，也同样能够长期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5月4日他给项英信中指出，在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较之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而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指挥员充分发挥我军优势，灵活机动地展开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内战时候很大不同。当然，无论何时应有谨慎的态度，具体的作战行动应在具体情况许可之下，这是不能忽视的。”

为不反复强调华中能够开展游击战争的可能性，1938年5月14日中央书记处又致电项英，指出根据华北经验，在敌人后方，即便是平原地区，极便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游击根据地的创造。新四军在华中地区更能自由的发展与扩大自己的力量与影响。只要部队领导自己不犯严重错误与慎重从事，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党中央要求新四军利用当时有利时机，主动的积极的深入到敌人后方去，千方百计地开展游击战争。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平地较之山地当然差些，然而决不是不能发展游击战争，也不是不能建立任何根据地。河北平原、山东的北部和西北部平原，已经发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平地能够发展游击战争的证据。”“依据河湖港汊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

1940年初中央书记处进一步指示项英并东南局：“华中可以发展（彭雪枫部由三连人发展到十二个团，李先念部由几百人发展到九千人），而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十余师的威胁和限制的时候，我们曾主张从江南再调一个到二个团来江北，以便大大的发展华中力

量。”

1940年夏毛泽东又致电项英，“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日。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

毛泽东不但论证了华中地区同样可以象华北地区那样灵活机动地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尤为重要是毛泽东还多次指明新四军最合适的发展方向和进军地区。随着敌情的变化，毛泽东不断更新自己的策略方针与进军方向。这是毛泽东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灵活务实的指挥艺术的充分体现。

1938年2月，新四军建立不久，毛泽东即致电项英、陈毅，“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础。”同年5月4日，毛泽东又致电项英：“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

毛泽东在1938年5月又致电项英说：“徐州失守后，河南将迅入敌手，武汉危急。彼时蒋将同意我军南进，在鄂皖苏鲁四省深入敌之后方活动。”1938年6月毛泽东又致电项英：不但太湖以北吴淞江以西广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准备派出一小支队。同年11月，毛泽东又与王稼祥刘少奇等致电项英：“一、白崇禧已允新四军张云逸同志率一个营到长江以北安徽境内活动，已否派去？二、现有安徽中部最便利我军活动，新四军可否派二个至三个营交张云逸同志率领过江。”

1940年初，国民党的反共分裂倾向日益严重。毛泽东提醒项英，你们要“准备应付华中急变”，指出你们的出路主要在江北，虽然已经失去曾有过的良机，但仍有希望向江北发展的前途。他认为我党我军

的总方针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发展则应着重鲁苏皖豫鄂五省”，将来要发展豫省，因为“河南是我们全国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他还希望八路军派出兵力帮助新四军创立皖东、淮北、苏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的许多党政领导人有力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使新四军在许多地方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为后来粉碎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高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对新四军发展前途的重要战略思考，是他对新四军发展壮大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新四军从创建到今年已整整 60 年了。然而，我们今天重温毛泽东关于新四军在华中地区必须敢于发展的一系列论述，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反对党内右倾投降主义；关于新四军可以在平原地区发展及进军方向等等，我们感到毛泽东的立场观点和科学精神仍然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重要理论指导与现实意义。让我们更好地结合当今时代特点来继承与弘扬这份宝贵的理论遗产和精神财富。

周恩来在皖南事变前后

杨家余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事变前后风云险恶的日子里，周恩来时刻关注着新四军的安危，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机智灵活地处理着和新四军相关的各种复杂事态，参予中央的重大决策，巧妙而又恰到好处地击退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赢得了国内外各方对我党和我军的同情和信任。

1940年下半年，国内局势愈益恶化，国民党的反共活动不断升级。这种变化的发生，直接受着当时国际形势急速变动的影响。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签订协定，正式结成三国同盟。在这前后，英、美也签订了协定。这两大集团为了各自利益，都积极拉拢蒋介石。与此同时，蒋介石还继续得到苏联的援助。国际上的三大力量都在拉蒋介石，这使蒋介石自感身价陡增，兴高采烈，得意忘形。把这一形势看作是大举反共的有利时机，觉得有恃无恐，于是便下了发动皖南事变的决心。

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长的名义致“皓电”于朱德、彭德怀、叶挺，以最后通牒的形式限八路军、新四军在电到一个月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国民党军令部并向顾祝同发出围攻新四军的密令。对于国民党发出的反共信号，周恩来极为警惕，10月24日，身在重庆的周恩来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及时电告毛泽东：现反共高潮是正在着着上升。他敏锐地作出判断：“何、白十九日电是表示了国方

决心。”

面对如此严重的局势，中国共产党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11月1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断言：“破裂的危机已至”，“反共局部战争会开始。”建议中央“软硬两用，表面让步，实际自干”。对于新四军的行动问题，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是新四军主力北移，让出江南，到江北坚持斗争；另一个是皖南新四军一部分转苏南渡江，一部分就地打游击，江北的部队不论怎样都必须作应战的准备。对何、白的“皓电”，周恩来认为，“皓电”的原则和办法决不能同意，但必须给以回答，不能置之不理。他在11月1日致电中共中央时建议：“用朱、彭、叶、项名义通电答复何、白”，表示皖南新四军在有充分保障的条件下，可以移到江北；但要保证在移动中不许国民党军袭击。

中共中央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在十一月九日用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出“佳电”，对“皓电”作出公开答复。电文一方面坚决驳斥“皓电”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造谣和攻击，另一方面又采取缓和态度，申明为了顾全大局，决定将江南新四军“遵令北移”，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这个合情合理的立场，在政治上赢得了广大中间力量、包括不赞成国共分裂的国民党人士的同情。

为了使世人进一步了解事实真相，周恩来通过各种渠道对社会各界进行大量的解释工作，向他们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团结抗日的立场，揭露国民党制造磨擦、破坏国共合作的真实情况，以争取他们的同情。对于各国外交人员和记者周恩来也进行广泛的接触。当时美国作家斯特朗从苏联回国，途经重庆，周恩来利用这个机会同她长谈了几个晚上，说细地介绍国民党两年来制造反共磨擦事件的真相，八路军、新四军的历史的现状，并预言更大的反共事变将接踵而至。所有这些对于皖南事变发生后社会舆论的向背有着重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同国民党就新四军北移问题继续进行谈判，要求推迟新四军北移的限期。并据项英来电，写信给张冲，列举国民党在各地的反共事实，特别提出新四军皖南部队已整装

上道，但一切补给无着，而国民党的军队却步步进逼，造成对新四军的半包围形势，使它失去渡江北移的可能。要张冲急报蒋介石予以制止。

12月25日，周恩来应邀往见蒋介石，会见中就新四军北移等问题蒋介石作了许多承诺。对此周恩来在第二天向中共中央的报告时一针见血地写道：蒋的承诺是靠不住的，其实局部的“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周恩来确实把蒋介石给看透了。事实上12月底，国民党准备围攻新四军的部队已分别开到指定地点，构筑碉堡工事，基本完成了对新四军的合围态势。就在蒋介石会见周恩来之后不到十天，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终于发生。

1月9日，周恩来获悉新四军陷入重围万分愤慨，立刻向张冲提出严重抗议，并即电项英：要集中一切力量，冲破敌人封锁线，突围后将部队分散北上。接着又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分别提出抗议。1月11日，当周恩来得知新四军形势危急时，立即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事变发生后的局势和斗争的方针。组织力量，广泛地向国民党内主张团结抗战的人士以及社会各方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周恩来还写信给蒋介石，要蒋介石命令国民党部队立即撤围，给北上的新四军让路。他在信中说：否则新四军渡江无路，后退无援，只有突围四出，散于民间，战于敌后，以求生存。

这时中共中央十分担心周恩来和南方局其他重要成员的安全，要求周恩来等于最短时间离开重庆。但周恩来却置个人生死以度外，关注着新四军的安危和时局的发展，始终坚持战斗在斗争的第一线。

二

1月17日晚，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和发言人谈话，诬陷新四军“叛变”，悍然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声称要把叶挺交给军法审判。国民党的反共高潮达到顶点。

为了反击国民党的猖狂进攻，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重庆同国

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月17日晚上，周恩来得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反动命令和谈话后，立即义愤填膺地打电话给何应钦，痛斥他：“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随即驱车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处，当面提出质问和抗议。当天深夜，周恩来满含悲愤，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题词在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中传开之后，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一下揭穿了皖南事变的实质，表达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最强烈的抗议，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2月2日，毛泽东从延安致电周恩来说：“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往。”

针对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1月17日的通令和发言人谈话，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提议实行政治上的全面进攻，进一步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建议：就皖南事变真相编印各种材料在国内外发表；用新四军各支队名义发出通电，拒绝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要求恢复新四军，释放叶挺和被捕官兵，退还枪枝器材，控告顾祝同、上官云相，要求严惩肇事将领，并声明在原地坚持抗战，决不接受任何乱命；由八路军将领发表通电，一面声援新四军，一面表示坚持抗战，保卫西北，要求发饷发弹，保护交通，抗议撤销驻桂林办事处；由延安发表一个广播谈话，并印发各地。中共中央采纳了周恩来的这些建议。

为了实现政治上的全面进攻，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在重庆广泛地同社会各界人士接触，进一步争取了人心，更多的人看到：这次是国民党把事情做到如此决绝的地步，因此破裂的责任完全在蒋介石方面，人们的同情越来越多地转到中国共产党方面来。同时在外交方面，周恩来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英美政府对蒋介石的反共限共政策本来是赞同的，但又害怕由此引起中国的大规模内战，不利于他们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目的。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请周恩来到自己家里，周恩来用事实揭露了皖南事变是国民党蓄意消灭皖南新四军、

制造内战。卡尔闻告后即前往劝告蒋介石停止国内冲突，处理问题不要操之过急，以免造成更大事变。英国政府收到卡尔报告后，也告诉蒋介石说，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

2月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来华访问。周恩来排除各种干扰与之相见。会见中，周恩来针对美国因担心日本南进而急盼中国内部团结抗日、以便牵制日本兵力的心理，向居里提供了国民党制造磨擦的材料，说明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将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停火，而便于日军南进。居里向周恩来表示：美国赞助中国统一，反对日本。如果中国分裂，美国将很难给予援助。他也承认：要是没有内外压力，中国的改革是不可能的。如果内战扩大，抗战将更不可能。随后，他会见蒋介石时正式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美国在援助国民党问题上的态度发生这样骤然的变化，对国民党是很大的压力，使宋子文“甚以此为虑”。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认为，目前剿共不是最良时机，主张严令国军不妄发一弹，以防引起破裂。蒋介石在2月1日的日记中也写道：“新四军问题，余波未平，美国因受共产党蛊惑，援华政策，几乎动摇”。另外，周恩来同苏联驻华使馆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武官崔可夫先后向何应钦、白崇禧等提出质问。蒋介石这时还需要取得苏联的援助，只得要张冲和王世杰分别宴请潘友新和崔可夫进行解释。1月25日，潘友新会见蒋介石，向他指出：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他要蒋介石注意，对中国来说，内战意味着灭亡。

周恩来还动员国际舆论对蒋介石施加压力。斯特朗回到美国后不久，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建议她发表所知道的情况，并附去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的命令。斯特朗立刻通过纽约一些报纸和《美亚》杂志，披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

局势的发展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在国内外舆论的一片责难声中和英、美、苏三国政府的外交压力下，蒋介石突然发现在政治上已陷入异常孤立和被动的境地。国民党刚刚在1月17日把

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顶点，还没有来得及展开，便不能不悄悄收缩退却了。

1941年1月27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央纪念周的演说中宣称：皖南事变“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以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力图颠倒是非，缩小事件范围，为己开脱罪责。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召开前夕，蒋介石为了掩饰其破坏抗战，制造分裂的罪行，逃避国内外各方面的责难，摆脱政治上孤立的困境，千方百计诱胁共产党参政员出席参政会。周恩来将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交给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转交蒋介石，明确表示在国民政府未采纳之前，“碍难出席”国民参政会。3月1日，参政会开幕，国民党当局又催促共产党参政员出席会议。为了争取更多的同情，参政会开会的第二天周恩来又采取新的主动行动，致函张冲转蒋介石，提出中共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并说：“倘能蒙诸采纳，并获有明确保证，则敝党参政员届时必能报到出席。”这十二条临时解决办法是中共中央采纳周恩来的建议，在两天前提出的，其中提出了释放叶挺，回任军职，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退还皖南所有被获人枪等。由于国民党拒绝答复共产党先后提出的两个十二条，共产党拒绝出席二届国民参政会，粉碎了蒋介石掩饰罪责的阴谋。3月8日，蒋介石在中共的反击和国内外压力下，不得不声明和保证“以后亦绝无剿共的军事”，暂时收敛其反共气焰。

国民党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发动反共高潮，不但没能达到预期目的，反而适得其反。在皖南事变前后关乎新四军的安危、关乎国共两党关系的斗争中，周恩来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周恩来与新四军的创建

马学勤

今年10月12日是新四军建军60周年,明年3月15日将是周恩来诞辰100周年。此时此刻,我们回顾历史,总结周恩来呕心沥血、披荆斩棘、竭尽所能,为新四军创建所作的不懈努力,所表现的无私无畏的英勇顽强精神,和所建树的丰功伟业,不但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与国民党进行艰苦曲折的谈判,实现国共合作,为新四军创建创造条件

实现国共合作,是新四军创建的前提条件。周恩来通过与国民党的艰苦曲折的谈判创造了这个条件。

1936年12月爆发的西安事变,经过周恩来艰苦细致的工作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为国共两党的合作谈判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联系渠道。

为了尽快实现国共合作和联合抗战,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共同救国;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等。这些保证,是为了实现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反对日本的侵略而进行的一个让步。

1937年2月9日开始,以周恩来为全权代表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等在西安就国共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中共方面重申了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并对红军改编和苏区政府问题提出了合理的主张。西安谈判虽然进行